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研究*

朱涛^{1,2a},周杨^{2b}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a. 社会与民族学院; b. 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北京 102488)

摘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共中央提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定性表述内涵丰富,但当前学界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认识仍较为模糊。通过考察和梳理联合国等机构的有关定义和标准,可综合划分出“中等发达国家”的合理比较范围。更进一步,我国要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可对标比较当前波兰、葡萄牙等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发展进程中,我国还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政府应进一步发挥其发展引导作用,在区域协调发展、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全球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扎实稳妥地推进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26)02-0010-12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科学擘画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新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体地,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2035年重要发展目标,即到2035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 收稿日期:2025-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SH004)“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23ZKJC038)“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

作者简介:朱涛(1981—),男,浙江杭州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周杨(1990—),男,河南南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朱涛,周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研究[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3(2):10-21.

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增长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要求GDP的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充分考虑了目前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深入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科学合理地构建指标体系,有针对性地确立量化增长目标。从现实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①,2023年我国人均GDP(按照2021年的美元价格进行购买力平价换算)为2.21万美元,已连续四年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但什么样的水平才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哪些国家属于“中等发达国家”?国际国内的界定标准模糊,甚至连“发达国家”的认定,也有诸多不同的标准。例如新加坡一般被认定为发达国家,但在有些认定标准中却又未被包含。可见,研究“中等发达国家”的含义,并对其发展水平进行较为精确的界定,对于科学分析当前形势、合理制定工作计划、提出发展目标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界定

(一) 发达国家:定义与标准

世界上有数百个经济体,目前有多种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对这些经济体进行“发达”“发展中”的划分。综合来看,比较有影响力的划分标准有以下8种:

1. 联合国统计司(UNSD)标准。1996年起,联合国秘书处在其制定的《用于统计的国家和地区标准编码》(M49)中引入“发达”和“发展中”的区分。不过,UNSD同时指出,联合国系统内并没有对“发达”和“发展中”做官方界定,M49中区分出“发达国家和地区”仅仅是为了方便某些统计的需要。2022年,UNSD更新了这一分类,增加韩国作为“发达地区”,使得属于这一类别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67个^②。

2.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标准。DESA在其历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将经济体划分为“发达经济体”(Developed Economies)、“过渡中经济体”(Economies in Transition)和“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Economies)。在2024年的报告中^[2],DESA认为发达经济体包括37个,相比2023年同样增加了韩国。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标准。UNCTAD是联合国的常设机构。自1991年以来,UNCTAD成员被分为4组:A组主要包括亚太和非洲的国家,B组由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组成,C组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成,D组则由东欧国家组成。其中,B组成员基本都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国目前为A组成员。2021年,韩国提出本国的地位变更案,从A组进入了B组,成为B组的第32个国家。截至2024年11月,B组国家共32个^③。

4.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标准。UNIDO在其每年发布的《工业统计手册》中,将经济体划分为“工业化的”经济体和“工业化中的”经济体;又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收入数据,将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3类。在最新的2024年统计手册中^[3],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共有42个。

①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②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M49分类标准,<https://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③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员名单,<https://unctad.org/about/membership>。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标准。UNDP 根据其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把世界上193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分为4档:极高、高、中等、低。中国目前排在第75位,HDI指数为0.788,属于第2档。相比2022年,UNDP发布的《2023/202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①的数量从66个增加到69个,去除了原排名第63位的毛里求斯,增加了圣基茨和尼维斯,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以及塞舌尔共和国。

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发达国家”这一概念最早来自1961年成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ECD通常被看作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目前共有38个成员国^②。

7. 世界银行标准。自2016年起,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指数报告》(WDI)中取消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说法,改为使用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世界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4个组别。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2024年最新的分类使用2023年数据计算得出^③,其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GNI在14006美元以上,俄罗斯、保加利亚和帕劳共和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使得这一分类包含86个国家和地区。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展望数据库”将全球196个经济体分为两类:发达(Advanced)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Emerging and Developing)经济体。IMF指出,上述划分依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货物及服务出口总额和人口等指标,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中国属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根据2024年IMF的最新数据,发达经济体目前包括41个国家和地区^④。

综合来看,上述对“发达国家”的定义和标准都颇具影响力,但也都有其适用的具体场景和不足之处。第一,这些定义和标准对“发达”和“发展中”的划分有其各自目的,与本文希望“研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以作为我国2035年目标的比较对象”这一研究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例如OECD设立的目的是“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帮助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就国际合作的规则达成一致”等^⑤;世界银行对国家进行划分既是为了分析,也是为了给不同分组的国家设置不同的借贷条件;UNDP的HDI指数考虑预期寿命、教育水平等因素,但我国2035年发展目标中,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仅为经济增长目标,我国有其他指标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进行衡量。第二,一些标准中的划分方法缺乏足够的清晰度,依赖制定者的经验判断,这些经验判断有些甚至属于“政治行为”。第三,一些标准中的划分方法过于复杂,导致其应用范围有限。更为复杂的是,有些标准还会在“发达国家”这一大类下再进一步划分,例如DESA就会在“发达经济体”之下再区分出“主要发达国家”(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依据为是否属于G7的成员。从结果上看,这些标准均未获得一致认可。OECD后来增加的墨西哥等成员国被认为可能还算不上发达国家;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NI排序的划分方法会造成文莱、卡塔尔比英国、法国、德国还“发达”的感觉,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human-development-index>。

② 数据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名单,<https://www.oecd.org/about/document/ratification-oecd-convention.htm>。

③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国家分类(按收入水平划分,2024-2025),<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world-bank-country-classifications-by-income-level-for-2024-2025>。

④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WEO)经济体分类,<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4/October/groups-and-aggregates>。

⑤ 参见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介绍,<https://www.oecd.org/en/about.html>。

因而广受争议。由于存在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联合国的主要出版物中,关于“发达”和“发展中”的区分逐渐减少,使得对“发达”的界定更为模糊。

为此,本文认为需使用更为综合的界定方法。首先,从众多对发展水平的分类方法中选出一些彼此相互独立、较为权威的划分,即上述的8种标准;其次,如果一个国家在这8项标准中同时被3项以上标准认定为“发达国家”,那么就认为其确实属于“发达国家”。这一门槛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共识,同时也考虑到了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这种界定方法的优点如下:(1)相对简单、可重复、可解释;(2)可以避免单一标准的偏误,更为客观、中立,尤其对于墨西哥、土耳其、南非这些处于一些标准“边缘”的国家,进行“投票”式的多标准判断可帮助明确归属,减少误判的风险;(3)这样界定出的国家列表更加稳定,如果一个国家刚刚跨过某个门槛,被其中一两个标准认定为发达国家,也不会影响到研究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有48个国家至少包含在三个类别中(按人均GDP排序):卢森堡、新加坡、爱尔兰、挪威、瑞士、文莱、美国、丹麦、荷兰、冰岛、安道尔、奥地利、德国、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马耳他、巴林、加拿大、芬兰、法国、意大利、英国、塞浦路斯、韩国、新西兰、以色列、斯洛文尼亚、捷克、西班牙、立陶宛、日本、波兰、波多黎各、爱沙尼亚、葡萄牙、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俄罗斯、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智利。这些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发达国家。

对上述48个“发达国家”的GDP和人均GDP数据进行统计,卢森堡的人均GDP最高,为13.05万美元^①,最低为智利的2.95万美元。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美国,3.35亿人,人均GDP为6.46万美元。人口最少的国家为安道尔,8万人,其次为冰岛,39.33万人,人均GDP分别为6.46万美元和6.69万美元。

为确认方法的效度,需要审视“在8项标准中同时被3项以上标准认定为发达国家”。在上述8种标准中,有19个国家被所有的标准包含,这些都是公认的最发达国家。有41个国家被4种以上标准包含。有51个国家^②和1个地区被3种以上标准包含,其中被3种标准包含的有10个国家和1个地区,包括波多黎各、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这些被认为是排名中等或者靠后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被2种标准包含,其中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为卡塔尔,最低国家为瑙鲁(其人均GDP只有中国的56.3%),这些国家通常都不被视为发达国家。因此选择“被3种以上标准包含”作为发达国家的判定标准较为合理。

(二)“中等”的界定

界定“发达国家”范围后,还需要对“中等发达国家”进行界定。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发达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然后试图寻找其“中间”水平。发达国家的总GDP(按购买力平价)为77.90万亿美元,总人口为13.97亿人。平均后的人均GDP为55751.72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口中位数位于意大利,其人均GDP为52636.29美元。但实际上,这种方法不尽合理。人口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并不平均,所以这样得出来的水平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水平。另有一些相关研究也列出了若干“中等”标准:(1)将发达国家分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然后将“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作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基准值;(2)将世界银行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50%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

^① 数据同样出自世界银行,以下不再赘述。

^② 本文使用的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中缺少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摩纳哥等国的数据,因此并未将其包含在48个发达国家的列表之内。

基准值^[4]; (3) 将各个“发达国家”列表中均出现的国家作为“高等发达国家”, 将出现 2 次到 4 次的作为“中等发达国家”^[5]; (4) 将美国水平的 40%~60% 视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6]; (5) 使用额外的 8 个指标大类(人口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生活质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创新能力指标、信息化程度指标、生态化程度指标), 将发达国家名录中每个国家逐项指标的平均值填入, 再应用特别设计的算法求出这些国家的“总平均集合”来代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些方案有的较为复杂, 难于操作, 有的在统计学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中等发达国家应该排除掉刚刚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线的“新兴”发达国家, 以符合我们对于“发达国家”的期待; 也应该排除掉一部分顶尖经济强国, 以方便作为我国发展进程中的比较对象。为此, 比较合理的划分方法是参考崔俊富等^[7]、吕光明等^[5]对于初、中、高等的划分, 以四分位数作为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标准。按照这种划分, 中等发达国家包括 24 个(表 1), 总人口为 6.84 亿人, 总 GDP 为 35.75 万亿美元。

表 1 数据中 GDP 和人均 GDP 数据按照 2021 年的美元价格进行购买力平价换算, 用于国际比较。根据这一数据标准, 2023 年中国的 GDP 为 31.23 万亿美元, 人均 GDP 为 22 137.60 美元; 葡萄牙的人均 GDP 为 41 535.84 美元。由于计算方法不同, 这一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和人均 GDP 数据有所不同。为避免相关数据混淆, 表 1 中使用各国人均 GDP 相对于我国的倍数代替了具体数值。中等发达国家中, 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为德国和比利时, 分别为 63 154.67 美元和 62 933.10 美元。人口最多的国家为日本, 约 1.25 亿人, 人均 GDP 为 45 915.35 美元。

表 1 中等发达国家(2023)

排名	国家	人口(万人)	人均 GDP 相对于我国的倍数
1	德国	8 328.00	2.85
2	比利时	1 178.74	2.84
3	瑞典	1 053.66	2.83
4	澳大利亚	2 665.89	2.73
5	马耳他	55.27	2.69
6	巴林	157.71	2.58
7	加拿大	4 009.78	2.56
8	芬兰	558.39	2.55
9	法国	6 828.75	2.44
10	意大利	5 899.35	2.38
11	英国	6 835.00	2.38
12	塞浦路斯	1 344.98	2.36
13	韩国	5 171.26	2.28
14	新西兰	5 223.10	2.19
15	以色列	975.66	2.18

续表1

排名	国家	人口(万人)	人均 GDP 相对于我国的倍数
16	斯洛文尼亚	212.05	2.16
17	捷克	1 086.40	2.15
18	西班牙	4 834.79	2.14
19	立陶宛	287.16	2.09
20	日本	12 451.67	2.07
21	波兰	3 668.74	1.97
22	波多黎各	320.57	1.94
23	爱沙尼亚	137.03	1.88
24	葡萄牙	1 057.82	1.88

从表 1 来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的波兰、葡萄牙的人均 GDP 大约是我国的 2 倍。这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处于欧盟中等国家之列。两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社会治安良好,市场化程度高,在东欧、西欧有一定的地理位置优势,可辐射欧洲和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守门员”,这些国家作为我国 2035 年目标的比较对象,即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比较对象是较为合适的。

三、从省域和县域来看中等发达水平

在整体锚定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后,考虑到我国疆域辽阔,省域间、县域间的发展还不平衡,仍有必要审视讨论省域、县域的发展水平。从省级行政区域的数据看,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人均 GDP 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表 2)。在县(区)级,以北京市为例,2024 年北京市西城区人均 GDP 达 55 万元^①,是全国平均水平(9.57 万元)的 5.7 倍,远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昌平区、大兴区的人均 GDP 仅为约 7.98 万元、7.35 万元,只有前者的七分之一。这提醒我们需注意我国区域发展状况的复杂性。

从表 2 来看,在省域层面,2024 年我国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 4 个直辖市)中人均 GDP 最高的是江苏省、福建省和浙江省,分别为人民币 16.07 万元、13.79 万元和 13.56 万元;人均 GDP 最低的省份是甘肃省,5.28 万元。4 个直辖市中,人均 GDP 最高的为北京市,为 22.80 万元;人均 GDP 最低的为重庆市,为 10.09 万元。人均 GDP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是江苏等 7 个省(自治区)与 4 个直辖市。更进一步,在省域层面人均 GDP 如果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致相当于当前阶段我国江苏省的发展水平,或者相当于我国直辖市中上海市和天津市之间的发展水平。

表 2 省级人均 GDP 数据(2024)

排名	地区	人口(万人)	人均 GDP(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	北京市	2 183.20	228 000.00	5.33%
2	上海市	2 480.26	217 423.62	5.29%

^①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统计局,2024 年数据均为初步核算数据,下同。

续表2

排名	地区	人口(万人)	人均 GDP(元)	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	江苏省	8 526.00	160 694.00	5.80%
4	福建省	4 193.00	137 920.00	5.50%
5	浙江省	6 670.00	135 565.00	4.70%
6	天津市	1 364.00	132 143.00	5.00%
7	广东省	12 780.00	111 146.00	3.00%
8	内蒙古自治区	2 388.00	110 011.00	6.10%
9	湖北省	5 834.00	102 832.00	5.90%
10	重庆市	3 190.47	100 889.00	6.00%
11	山东省	10 080.17	97 781.88	6.15%
*	全国	140 828.00	95 749.00	5.10%

县域是我国发展和治理的重要单元,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点。我国有超过 70% 的人口位于县域,但多数县域的发展相对缓慢,与市域存在较大差距。在县域层面,我国百强县(包括县级市,不包括市辖区)中前 10 名在 2023 年的人均 GDP 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十强县(市)人均 GDP 数据(2023)

排名	县(市)	常住人口(万人)	GDP(亿元)	人均 GDP(元)
1	江苏-昆山市	125.65 ^①	5 140.60	409 121
2	江苏-江阴市	178.51	4 960.51	278 000
3	江苏-张家港市	144.02	3 365.80	233 100
4	江苏-常熟市	168.29	2 800.16	165 921
5	浙江-慈溪市	187.19	2 639.45	141 261
6	福建-晋江市	208.00	3 363.50	161 863
7	江苏-太仓市	84.80	1 734.94	205 100
8	江苏-宜兴市	128.46	2 337.53	181 700
9	湖南-长沙县	143.47	2 129.52	148 430
10	浙江-义乌市	190.30	2 055.62	108 447
*	中国(2023 年)	140 967.00	1 294 271.70	91 746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些县(市)没有发布 2024 年的数据,为了方便比较,本文使用了 2023 年的数据。同时,十强县(市)的排名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如慈溪市的人均 GDP 就低于排名更加靠后的县(市)。可以看出,如果对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 GDP 在县域层面大致相当于我国十强县(市)的中游发展水平(如常熟市或晋江市)。

① 根据统计公报,该数目为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仅供参考。

有研究显示,百强县以不到全国2%的土地和7%的人口,创造了25%的县域GDP,而剩余县每县的GDP贡献率不足百强县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8]。我国还存在不少人均GDP较低的县,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等地,如甘肃的礼县、广河县、康乐县,青海的甘德县等。如2022年广河县的人均GDP仅为9217元,2023年康乐县的人均GDP为12009元。进一步的研究将县域分为高基数高增长、高基数低增长、低基数高增长和低基数低增长4种类型,在我国超过2000个县域中,有335个以上的县域处于低基数低增长状态^[9],是推进现代化、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短板。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不意味着每个县的人均GDP都要达到百强县的人均GDP水平。通过百强县与欠发达县的比较,能客观认识到我国县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四、风险挑战及政策建议

(一) 风险挑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已经形成了若干现代化城市群,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与此同时,人均GDP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仍然面临着若干风险和挑战。

第一,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整体上,我国发展呈现东西差距和南北失衡的局面^[10]。地区发展差距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软肋。(1)在省域层面,虽然2010年到2023年间,各省域人均GDP变异系数持续下降,但2024年有所上升,且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也在扩大^[11],人口、资本持续向经济优势地区集中。(2)在县域层面,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对不足。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看,县域存在人口流失趋势加重,产业集聚不足等问题。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间,全国超过60%县域的常住人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一些县域的人口流失超过15%。县域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也存在很大缺口。(3)城乡差距方面,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绝对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集体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健全^[12]。进入数字时代,城乡之间还出现了数字接入鸿沟和数字应用鸿沟的情况。2024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78.6%,其中城镇地区为85.3%,农村地区为67.4%^[13]。从人群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常住人口为主,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年龄因素和设备不足制约着他们享受数字经济的红利。

第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带来的风险和挑战。(1)劳动力要素。人口红利下降,包括劳动力供给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升高,影响到我国劳动力的流动和要素配置以及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性^[14]。(2)资本要素。政府财政吃紧,影响到其在公共领域的支出。社会资本的投资增速放缓、活力不强。部分企业信心不足,收缩资产负债表,削减投资和开支。此外,尽管我国剔除资本溢价后的基础资本回报率仍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资本回报率也有一定的下降^[15]。(3)土地、资源环境要素。水土资源消耗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巨大。我国多个省份对能源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大,制约其经济发展。

第三,社会矛盾凸显带来的风险和挑战。(1)转型时期也正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敏感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要素和财富向一些群体集中的情况。一方面,财富分配不均会影响经济激励和自主创新水平,阻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既得利益群体为保护自身利益会抵制

进一步改革,拖累经济发展。利益群体也是导致拉美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16]。(2)数字技术的发展放大了一些既有的社会冲突,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个体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复杂多元,大量新型纠纷伴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涌现,如网络交易纠纷、网络侵权纠纷、网络言语暴力纠纷等。“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矛盾,给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目标的达成带来挑战^[17]。

第四,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挑战。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使得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受挫折,至今尚未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18]。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不仅面临着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全局性挑战,也面临着地区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带来的潜在风险,还面临着局部冲突造成的常态化威胁。各种外部风险交织在一起,需警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到203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很可能会有所提高,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水平也将会随之提高,这也是外部环境给我们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带来的挑战。

(二) 政策建议

考虑到上述风险和挑战,我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需充分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2035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相应的政策支撑。积极有为的政府可以在抵御外部风险、积累人力资本、快速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破除区域之间经济壁垒、避免过度城市化、更好地供给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这既有利于进一步创造和发展先进生产力,又使得现代化的成果充分惠及全体人民。

第一,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持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是扎扎实实做好补短板、固底板、扬优势的工作。我国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目前半数以上省份的人均GDP在全国平均值以下,即使在超过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内部,也有一些地市低于全国平均值。这充分说明,补短板不可掉以轻心,只能加倍努力。二是积极促进人口和人才的流动。人口的充分高效流动可以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19],而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也是人才的循环。应进一步创新人口和人才的管理体制机制,破除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福利制度中妨碍人口和人才在国内大循环中自由流动的因素,完善流动所需的配套设施,强化人才激励机制。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区域制度藩篱。我国低基数低增长县域多位于省际交界区^[9],体现出明显的边界效应^[20,21]。应强化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创新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考核机制,激励各地方建设和维护统一大市场。此外,数字技术也能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发挥作用^[22]。

第二,在经济增长动力方面,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作用。一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整合现有生产要素、优化消费结构^[23]的功能。当前,一部分农村地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产业链的重组^[24],降低了各个环节的协作成本,实现了价值增长^[25],经验值得推广。二是完善数据制度环境来促进数据的使用,加快建立数据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让有价值的数字作为新兴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26]。三是充分发挥公共数据的作用,构建开放共享机制,建设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全面释放公共数据的价值。此外,相对于私人组织,政府在数字空间中有更大的比较优势^[27],应积极探索利用“国有数据”创造新质数字公共物品的方法,并扮演好大数据发展中“规划者”的角色。

第三,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多措并举化解社会矛盾,切实提升民众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获得感。

一是加大向民生保障转移支付的力度。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偏低。应继续加大社保方面的投入、增加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发放规模等。二是通过扩大就业来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尽管 2025 年以来就业形势稳中有进,但仍存在结构性失业问题,其中年轻人就业情况最受人关注。目前来看,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是民营企业,要持续改善营商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民企的投资意愿。三是想方设法增加民众的财产性收入,增强消费底气。当前,我国民众的消费和投资都较为保守。对此,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也要为民众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即由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获得财产性收入,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总之,要多措并举努力让普通老百姓富起来,钱袋鼓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能真正感受到与人均 GDP 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相匹配的获得感幸福感。

第四,在应对国际环境方面,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一是巩固国内大循环在我国新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把发展立足点更多放在国内。二是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之成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例如,绿色发展具有多重关键意义,既契合提升环境资源要素利用效率需要,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还为国际社会低碳实践树立典范。三是通过有序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四是在国际交往中保障国家安全。目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应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数据的保护,加强网络安全队伍建设和网络安全管理,高质量构建网络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体系。总之,我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能因为外界干扰影响自身的判断,也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深化全球合作,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总结和讨论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目标。当前,有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界定标准不一,如在“发达国家”的界定上,联合国统计司(UNSD)、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有其划分标准。本文综合探讨了“发达国家”以及“中等发达国家”的界定,选取被 3 个以上标准共同包含的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并根据四分位数划分出“中等发达国家”的范围。当前,波兰、葡萄牙等国是“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国家,其人均 GDP 约为中国的 2 倍,作为我国 2035 年发展目标的比较对象较为合适。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疆域广阔,面临着外部环境和内部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政府应进一步发挥发展引导作用,在区域协调发展、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全球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

现代化牵涉诸多方面的发展目标,人均 GDP 固然重要,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无法全面反映经济结构、创新能力、财富分布、民生福祉等状况,而这些恰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注意的问题。因此,即使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

化,还应综合考虑基尼系数、研发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等其他指标。同理,即使人均 GDP 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不能简单认为没有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任何指标都有其局限性。GDP 的概念在 20 世纪才出现,但现代化的过程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特别是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用原来工业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未来数字时代基础上的现代化,有可能是不合适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联合国、世界银行等一直在尝试研发和使用其他的指标来代替人均 GDP。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评价指标需应对新形势动态调整,以更科学、更客观、更真实地评价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8.
- [2] UN DESA.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4[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4: 135-136.
- [3] UNIDO.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Industrial Statistics 2024[M]. Vienna: United Nations, 2024: 149-150.
- [4] 梁昊光,李力.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定位、发展指标与战略路径[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4(1): 19-28.
- [5] 吕光明,陈欣悦. 2035 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J]. 统计研究,2022(4): 3-20.
- [6] 胡鞍钢,张泽邦,周绍杰. 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推进与区域性差异——历史进程回顾与 2035 年展望[J]. 社会科学辑刊,2024(6): 85-96.
- [7] 崔俊富,陈金伟,苗建军.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研究[J]. 兰州学刊,2024(4): 43-58.
- [8] 范毅,王笳旭,张晓旭.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建议[J]. 宏观经济管理,2020(9): 60-62.
- [9] 魏后凯,李瑞鹏. 中国县域发展差距变动及其协调路径[J]. 广东社会科学,2023(6): 37-47.
- [10] 胡鞍钢,周绍杰. 2035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1-22.
- [11] 孙志燕,侯永志. 对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多视角观察和政策应对[J]. 管理世界,2019(8): 1-8.
- [12] 周绍杰,钟晓萍. 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城乡协调发展的三重逻辑与推进路径[J]. 甘肃社会科学,2024(3): 1-15.
- [1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1-17)[2025-06-01]. <https://www.cnnic.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 [14] 蔡昉. 人口红利: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有益框架[J]. 经济研究,2022(10): 4-9.
- [15] 丁勇,郑娟. 我国资本回报率问题研究[J]. 调研世界,2021(8): 51-59.
- [16] 卢现祥,罗小芳.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2013(7): 71-79.
- [17] 朱涛.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解维度、治理结构与发展趋势[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6): 131-139.
- [18] 林卡,季梦婕,蒋闰润. 新征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反思与中国道路探析[J]. 社会发展研究,2022(4): 1-19.
- [19] 朱涛.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指标体系构建[J]. 探索与争鸣,2024(10): 122-131.
- [20] 唐为. 分权、外部性与边界效应[J]. 经济研究,2019(3): 103-118.
- [21] 张皓辰,郭研,吴群锋. 省际边界效应、区域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基于货物运输数据的估计[J]. 经济学(季刊),2024(3): 743-758.
- [22] 郭峰,熊云军,石庆玲,等. 数字经济与行政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再考察——来自卫星灯光数据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23(4): 16-33.
- [23] 田野,倪红福,王文斌. 经济结构演变的国际经验与基本规律——兼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J]. 改革,2024(2): 25-42.

- [24] 黄庆华,王馨可,潘婷.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现代化: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12.
- [25] 付伟,滕飞.数字柔性产业链: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J].浙江学刊,2024(2):40-49.
- [26] 戚聿东,褚席.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财经研究,2021(7):18-32.
- [27] 向静林,艾云.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23(11):4-23.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ZHU Tao^{1,2a}, ZHOU Yang^{2b}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a.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2b. Internet Law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is a key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a nation's level of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et the goal of basically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y 2035, which includes reaching the level of a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y in terms of GDP per capita. While this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is rich in implications, the current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what constitutes a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y" remains somewhat ambiguous. By examining and synthesizing relevant definitions and criteria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 reasonable comparative range for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be outlined. Furthermore, to achieve the 2035 GDP per capita target, China can benchmark against the current levels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Poland and Portuga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China still faces many risks and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inforce its guiding role, making sustained efforts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new growth drivers, ensuring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deepening global cooperation, thereby advancing modernization in a solid and steady manner.

Keywords: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y; GDP per capita; development goal;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邓龙奎)